

■金 丽/著

# 《圣经》与西方文学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文学研究

《圣经》与西方文学 / 金 丽

[摘要]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 《圣经》 西方文学 误读 《圣经》知识 《圣经》象征 《圣经》观念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2)01-0124-07

## Studying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A Biblical/Christian Viewpoint

JIN Li

(Chinese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bl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But due to differences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Chinese critics still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studying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the Biblical viewpoint, this has resulted in several problems in interpreting western masterpieces.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n which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Bible on western literature: basic knowledge and allusions, symbols and archetypes, and Biblical/Christian ideas.

**Key Words** :the Bible, western literature, five problems, three levels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本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常识性事实,正如不了解儒道释经典就读不懂杜甫、李白、王维、《金瓶梅》、《红楼梦》,乃至整个中国文人世界一样。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评论界从《圣经》角度理解西方文学依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 一、对西方文学理解上的误读

用《圣经》解读西方文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圣经》基督教是欧洲文学的一大源流,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来自这个传统。“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的历史,更具体地说,各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从《圣

经》中获得的启迪,因此研究西方文学,没有对《圣经》的最起码的理解显然是无从下手的。”<sup>[1][15]</sup>

可惜多年以来我们评论界,用《圣经》解读西方文学这一简单的事实并不在场,它被另一种话语的滔滔气势遮蔽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理性至上的观念和话语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自以为要把《圣经》和西方文学分析得清清楚楚。这种方法首先把《圣经》跟异化了的宗教搅和在一起扣上“精神鸦片”“梦的呓语”大帽子,认定《圣经》是西方文学最大的“毒瘤”,是要剔除的“糟粕”。对于西方文学作品本身,则宰割成现实背景、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几大块,由此来演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这一类批评固然简洁有力,却把《圣经》与西方文学两者联系中所包

含的复杂深刻的有极大蕴藏性、神圣性的东西横扫而光。于是毫不奇怪,我们看到,由于不了解《圣经》,特别是它跟西方文学的关系,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误读甚至错读。这方面问题至少可以总结出五个:

1. 不能进行多层分析和立体研究,片面强调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忽略其主题思想、特别是具有宗教人文精神的一面。以但丁《神曲》为例。我们评论多注意它如何反映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时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变革。《神曲》固然关心意大利民族的出路,但更关注人类的得救问题。它作为世界名著的价值首先在于,根据《圣经》基督教的宇宙人生观描述了作者经历地狱、炼狱、天堂,最后见到上帝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史诗,并由此表现了人类最终依靠信仰和神学,从黑暗到光明,从苦难到幸福,进入至真至善至美最高境界的主题。无论从主题、内容、结构、手法来看,《神曲》都是“诗化的《圣经》”。<sup>[2]</sup>

2. 对作品的中心或重点进行主次换置。这里谈的主次换置跟艺术接受论的“转义”与“变位”并非一回事,因为它不以研读文本为基础,而是固守某个意识形态、某个单一方法,不惜违背文本自身的约束和规定,在解读中进行一种有意的人为的变位和转义。例如《白痴》以梅思金为核心人物来展开情节,虽然作品有大量社会现实的描写,但更偏重于思想主题,“是描绘思想本身的小说”。我们的评论倾向在《白痴》娜司泰谢这个具有强烈叛逆性格及其被欺凌与侮辱的悲惨命运的女性身上做文章,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陷于金钱酒色血杀虚无的世界末日景况中按照《圣经》耶稣模式塑造的梅思金公爵却着笔不力。把《白痴》的重点从梅思金公爵换置到娜司泰谢,实在是歪曲了整个作品。

3. 无法进行主次换置时,就以“局限性”作结。从这个角度,西方文学不少作家都有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禀有《圣经》基督教情怀,他们创作与其说反映现实人生,不如说是要用《圣经》基督教精神给心灵找到立足的根基,为人性找到归依的出路。搞不懂《圣经》以及它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必然把这些作家的思想简单归结为“抽象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予以否定。

4. 笼统概括情节内容,无法进入文本的细致分析。这方面问题突出表现在对弥尔顿《失乐园》的评论上。评论普遍认为弥尔顿《失乐园》的价值主要在于反映了1640至1660年英国革命的历史形势以及以清教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这种看法强调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一面,却显然既不符合弥

尔顿的写作意图——“在《圣经》神话的领域选择重要主题”来反映具有人类共同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事件,更经不起对12卷“散发出思想神圣气息”的文本整体构架和细节精心安排的全面分析。

5. 不能抓住源自《圣经》的名称、典故、寓言、警句、象征等关键性提示,深入理解作品全局或某个重要部分。比如对《白鲸》理解上,它是一部反映捕鲸生活的小说,又包含复杂多义而又朦胧不明的象征和暗示,如何理解《白鲸》塑造的各种形象,一直是评论界的难题。如果我们注意到《白鲸》用了许多《圣经》的人名和典故,又能够发现《白鲸》的形象塑造跟《圣经》人名和典故之间的神秘联系,就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提示,找出正确解读作品的线索。

可见,不注意《圣经》跟西方文学的关系而引出的结果既是荒唐可笑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说明用《圣经》解读西方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好在当下,简单化政治意识形态、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逐步失去了霸权的话语,生硬的唯物主义、理性至上论也渐渐减少了横行的市场。特别由于多种现代批评方法引进和运用,评论界在文艺评论问题上达到了一个普遍共识:文学名著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待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去开掘,我们应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用多种方法去分析,对作品进行综合思辨和立体研究。在这个背景下,《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一些评论家开始注意到《圣经》对西方文学刻骨铭心的影响——它在西方作家心理性格、思维方式、情感趋向、价值观念打下的烙印,它为西方作家提供了词语典故、创作素材、人物原型、叙事结构、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

《圣经》是理解西方文学的“伟大代码”,这个常识已被认可。但是如何解读《圣经》的密码系统从而解读西方文学,这对于长期限于简单政治意识形态、庸俗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评论家,对于千年浸润在“现世人生”“实用理性”文化精神传统的我们说来仍然是个难题。我以为,从《圣经》的角度解读西方文学,可以在知识、象征、观念三个范畴展开。

## 二、从《圣经》知识解读西方文学

在知识的范畴,首先要熟悉《圣经》这一部集宗教、历史、文学、哲学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它的宇宙观、历史观、人性观、道德观、审美观、风俗习惯、体验和感受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它的基本文学样式——神话、传说、史诗、史传、小说、诗歌、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福音书文学、纪事文学、书信文学。它的主要题材、故事、人物。它的常用表现手法、语言习惯、结构、文体风格。它的人名、事件、术语、典故、格言、警

句。中国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关系的先驱朱维之指出：“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密密地交织着《圣经》底引句和典故，我们读者若没有一些关于《圣经》的知识，便不能了解并欣赏这些杰作”。<sup>[31165]</sup>朱维之这里就是从知识的层面上强调了《圣经》解读西方文学的重要性。

《圣经》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圣经》作为西方文学的创作素材。许多欧洲作家从《圣经》中吸取创作营养的源泉，中世纪以来，大量诗歌、戏剧、小说的题材或人物都取自圣经，如英国的行会剧《挪亚的故事》、布罗姆抄本剧《以撒献祭上帝》、叙事诗《亚当的滔天大罪》等。文艺复兴时期，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也都从《圣经》吸取素材。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该隐》、唯美主义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故事都来源于《圣经》。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雅各的故事》、《年青的约瑟》、《约瑟在埃及》和《赡养者约瑟》、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都取用《圣经》的题材。

第二《圣经》的人名、事件、术语、典故、格言、警句，特别是它们被引用到文学作品中的暗示对应意义。《圣经》典故、精言在欧洲文化历史中历经千锤百炼形成，是西方人的“子曰诗云”。《圣经》的人名、事件、术语、典故、格言、警句被引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意义的规定性和暗示对应性。比如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圣经》有名的格言，出于《申命记》32章，<sup>①</sup>耶和華借摩西之歌说：“他们失脚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又见《罗马书》12章：“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格言说明上帝拥有绝对的道德审判权，该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西方文学。列夫·托尔斯泰引此格言作为《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辞。由此不难想像他对安娜的态度：安娜因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尽管可以傲视虚伪的上流社会，但在上帝的最高法则面前，她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她背弃了做母亲做妻子的责任，不能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爱她私生的女儿，对情人也燃起了不可救药的妒火，这一切必然引起负罪感，羞耻感等痛苦折磨，最终摆脱不了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

夏·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有句：“上帝的公道终于应验了，灾难接连落到了我头上，我被迫穿过死荫的幽谷。”“死荫幽谷”出于《圣经》诗篇“第23首4节。大卫歌颂耶和華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西方语言中以“死荫幽谷”比喻极端痛苦的境地。

罗切斯特有地位有财产，但他发疯妻子的纠缠和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使他处于痛苦折磨之中，直到简爱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才看到了希望并想与她结合起来开始新的生活。不幸的是，由于他发疯的妻子存在，更由于简爱坚决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不愿意充当情妇，罗切斯特重新陷于痛苦困境。他用“我被迫穿过死荫的幽谷”表达命运坠入黑暗深渊的绝望心境。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劳伦斯一本小说《虹》（黑马，石磊译本）出自《圣经》的引文、比喻、暗指就有四十多条。国内近年出版的《圣经语典与妙用》书中也收集了四百多条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圣经语典。<sup>[4]</sup>

### 三、从《圣经》象征解读西方文学

比知识范畴深一层的是象征，它是用《圣经》解读西方文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知识是直接的、局部的、明确的，《圣经》人名、事件、术语、格言、警句被引征到西方文学作品中，只要是具备基本《圣经》知识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见，并明白这些引经据典的意思。象征却不是这种表面现象，它常常是间接的、整体的、隐蔽的。它或隐或显地借用《圣经》典故，注重的是《圣经》典故中凝聚的某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西方诸多文学作品除了引用一般《圣经》知识外，也大量运用《圣经》象征，使作品获得多层次意蕴，增强心理情感和思想深度。发现文学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引用的《圣经》象征，分析跟艺术表达相关联的《圣经》象征，考察作品形象与《圣经》象征之间的直接对应或转换生成的各种联系，解释这些神秘关系中蕴涵的价值和意义，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作者的深长用心及其作品特有的内涵。

解读西方文学的《圣经》象征，可分为三个方面：

#### 1. 整体、结构的象征

弗莱对《圣经》在西方文学上的发生学和元模式意义做出权威性描述和概括。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圣经》为西方文学提供了整体的、结构性的象征：《圣经》构筑了一个幻想的框架——我把这个框架称为神话世界。在这个框架之中，西方文学一直运行到十八世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迄今仍在其中运行”。<sup>[1114]</sup>《圣经》概述了从太初之时上帝创世万物，到世界末日上帝再临最后审判的全部人类的历史。

<sup>①</sup> 《圣经》引文参考比较了三个中文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和合本”，香港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国际圣经协会有限公司出版的“当代圣经”。本文主要引用了“当代圣经”版本。

它从“创世纪”伊甸乐园开始,进而展开人间沧桑的故事和事件,最后到“启示录”新天新地结尾,在文学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大约呈U形的叙述结构”。“在这种形式中,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会使情节发展到困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某种吉利的线索又使结局发展为一种大团圆”。<sup>[1] 1220</sup>《圣经》U形叙述结构也是意义的结构,它跟《圣经》的三段式人类历史景观一致,表达了神与人两重世界的关系:人神合——人神分——人神再合,也象征地表述了人从天真失落到苦难流离再到悔改归依的普遍命运。这种贯穿全书的U形象征结构在西方文学中体现极其明显,如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歌德的《浮士德》,伏尔泰的《老实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劳伦斯的《虹》,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

## 2. 局部、单个的象征

遍布在《圣经》基督教中的局部、单个象征也是西方文学想象和创作的基本因素。《圣经》在人类从天真无邪进入痛苦灾难再转向明朗快乐的不断重复的叙述模式之中纳入一系列神话传说故事:上帝造天地万物、捏泥土吹灵气而造人、天堂、伊甸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天怒天罚、失落、该隐被杀和鲜血、大洪水、挪亚方舟、衔橄榄叶的白鸽、雨后彩虹、巴别塔、召唤、选民、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献子作祭、雅各梦见天梯、摩西率众出埃及、西奈山神授十诫、失去耶路撒冷、收复耶路撒冷、先知的预言、耶稣的降世、耶稣被魔鬼试探、耶稣的训喻、耶稣行神迹、耶稣受死十字架、耶稣三日复活、启示中的幻象与憧憬,等等。这些故事包含着丰富深邃的象征意蕴,并以“沉积”的形式埋藏在西方文化区域世代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西方文学活动的意义单位。它们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对于作品的主题、结构、情景和人物等具有极大的提示性、阐释性。

例如《圣经》象征在哈代的《苔丝》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苔丝》进入第4部第34章,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中心所在。安吉尔和苔丝结婚当晚,相互吐露各自心中的秘密。安吉尔先坦白了自己“行为不轨、伤风败俗”的过错,接着苔丝坦白她与亚历克的经历。这时候哈代对背景作了极富象征性的详尽描绘:“灰烬被正上方的火光照着有如一片酷热的荒原……看到那炭火发出的斑斓红光便能看到末日审判的可怖景象。那可怖的光照到克莱尔的脸上和手上,也照到苔丝的脸上和手上……一个巨大的暗影在她的身后升起。”安吉尔和苔丝坐在炉火前的场景跟《圣经》上说的世界末日联系起来,是大有深意的。

《圣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描写了末日审判景象:“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书卷要打开,每人将要按照他在书卷中所记录的事迹接受审判。任何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被扔进火湖。《苔丝》中,此时此刻就是安吉尔和苔丝的末日审判。苔丝出于纯洁的爱情宽恕了安吉尔,但安吉尔却根据世俗道德无情地拒绝抛弃了苔丝。安吉尔对苔丝行使的是人的不公正的判决,导致苔丝以后一个接一个更可怕的厄运。由此我们感受到哈代从头至尾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在宗教式微、道德和精神无所依从的物质世界,苔丝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生存是悲哀无望的。

同样在这部小说,我们看到另一个源于《圣经》的重要象征——十字架。当亚历克——曾经因原始情欲驱动诱使苔丝失身落难的浪荡公子,后来也出于情欲活力而变成一个狂热传教士——再次见到苔丝,他心绪不宁,要求苔丝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起誓,从此不再诱惑他。美国学者认为,这里,十字架对于苔丝也意味深长:“它意味着从此时此地开始,她就背上了她的十字架,正像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一样。此外,它还意味着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将终止于她自己受难的地方——温塞斯特镇的山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她生命的结束共有14章,其中每一章都描写了一种艰苦的磨难,这些磨难与14幅耶稣受难像是相对应的。最后一期题名为“大结局”,这绝非巧合,因为在这一期里,苔丝如同耶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样,圆满地结束了她的命运”。<sup>[5] 1233</sup>

有些《圣经》象征的运用是非直指的,象征物蕴涵了含蓄模糊的深刻意义。仍拿《苔丝》来说,苔丝的命运显然有替罪羊的意味。替罪羊是《圣经》一个主体象征。根据《旧约》,以色列人要把牛羊作为祭品献给神以求赎他们的罪。在《新约》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殉难就是向神献祭的仪式,目的是承担人类罪孽的责任,以无私的爱呼唤世人的觉悟、良知的复活。在《苔丝》结尾,哈代把疲乏之极已经走到厄运尽头的苔丝摆在史前时代巨石群中心一个“祭坛石”上,这块石板是在古代宗教仪式上被用作放祭品的地方。苔丝躺在祭坛石上像待宰的羊羔,柔弱无力,一言不发,纯洁无辜,却受尽迫害和虐待。苔丝悲剧的收场酷似《圣经》“旧约”的祭献仪式,跟“新约”的耶稣的牺牲更是同出一辙。替罪羊的象征把《苔丝》的主体情绪和价值观组织成为一个核心,形成全书的潜在主题。通过替罪羊的象征,哈代告诉读者,这个世界冷酷无情、充满残缺和无常,像苔丝这些善良的人只能连遭厄运打击以至最后毁灭。她的命运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毁灭,不仅意味着女人在男人世界的失败,更是纯洁的被玷污,爱的被践踏。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过了一千八百多年,苔丝这个“纯洁的女人”也像替罪羊一样成为人类的牺牲品。“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抛弃我?”耶稣的呼喊再度响起,宇宙浸透了荒凉感,这是人类尘世命运的永恒循环吗?我们为苔丝悲哀伤感之时,是不是也记起耶稣的话:“别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28节)

### 3. 原型象征

原型是一种深层象征。人类文化学家、深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转变为一种潜意识的东西,它们由于生物性遗传和社会性继承而铸成了人类的精神生命机制、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潜意识的沉积形式被称为“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原型”等。它们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人类同构普泛性,但又由于文化、历史、地域、民族等因素影响而转换演变为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具体意象。尽管《圣经》中诸如大洪水、替罪羊、天堂与地狱、死与复活、英雄模式等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可能被追溯到更古远的背景给予发生学解释,但他们毕竟是在《圣经》里铸成了特定的表象形式从而具有明确的心理意义(比如讲“复活”而不是“轮回”),他们也是通过《圣经》传播而直接影响到西方作家。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圣经》的原型象征为西方文学创作提供了特定的体验和感受生活方式,规定制约了他们的审美情怀、美感表达方式。英国女学者鲍特金用贯穿于西方文明的一些《圣经》原型去阐释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之歌》等一系列文学杰作,描述了艺术家和读者对潜藏在素材或作品背后的原型内容的认同感受。<sup>[6]</sup>

## 四、从《圣经》观念解读西方文学

用《圣经》来解读西方文学的第三个范畴是观念,这是指研究《圣经》与西方文学的思想联系,从《圣经》角度考察作家观察世界的态度和方法、体验生活的情怀和意向。《圣经》是一种价值哲学,它是开元前古希伯来人(《旧约》)和开元初期希腊化了的希伯来人(《新约》)因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确立生存意义而形成的价值哲学经典。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圣经》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它的思想、道德、精神渗透西方世界各个领域,融化成了普泛的“欧洲的心灵”。艾略特说:“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我不相信,在基督教信仰完全消失之后,欧洲文化还能

残存下去。”<sup>[7] (P205-206)</sup>西方世界的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活动是朝向《圣经》还是背离《圣经》,他总与《圣经》存在着某种文化精神上的内在关系。换言之,《圣经》是西方作家活动的“现象场”、“心理场”、“知觉场”。如果我们不能、不愿进入这个场来解读西方文学,耶稣当然只是一尊穿西服的洋菩萨,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一切人”的信仰确实近乎痴人梦说了。

所谓《圣经》观念并不只是反映在西方中世纪长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教会文学的思想内容。那时《圣经》为世俗权力所利用,它的诸如上帝创世说、人类原罪说、灵魂不死说、末日审判说、天堂幸福说、基督救世说、禁欲奉献说等观念,已经变成了统治阶级的霸权话语。这里要谈的是,跟西方文化同生共存从来没有在任何震荡、断裂、反拨、颠覆中失去生命的一些思想。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经历了种种唯人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唯我主义,但是人类在人性解放、物质繁荣的大踏步前进中距离幸福越加遥远,世界并没有脱离苦难、罪恶、混乱,个人反而更深深地陷入空虚、荒谬、分裂、无意义感。西方一些作家——不论他们是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不满还是出于纯粹个人的情怀意念——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圣经》基督教传统里。《圣经》基督教是他们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圣经》基督教关于人的命运、价值和意义的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大致归纳起来,对西方文学影响持久的《圣经》观念有十个,它们是:

人性原罪:从亚当夏娃的故事到保罗名言“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圣经·新约·罗马书》第7章第15节)《圣经》自始至终表达了对人类原欲本性的怀疑和反省,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脆弱、不可靠的,容易导致错误和罪恶。莎士比亚剧中李尔女儿、爱德蒙、伊阿古、克劳狄斯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坏蛋,现代派乔治·奥维尔《动物庄园》,戈尔丁《蝇王》中不可思议的恶人,都反映了人性的原罪问题。写人根深蒂固的罪性、人万恶难赦的罪孽和罪行,是贯穿整个西方文学的惊心动魄的主题。西方人文时代以来就唱起的人之自我赞歌从来不曾压倒人性原罪这个阴森森的主题。

上帝审判:《圣经》从《创世记》偷吃禁果逐出天堂、该隐弑亲被罚以至《启示录》的世界末日最后审判,都象征地表明神性正义、上帝审判的观念。罪恶导致灾难,无辜者的鲜血在大地流淌,向上帝哭诉,上帝行使“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行恶者必将最终毁灭。人靠自身努力根本无法摆脱人的罪性、罪孽、罪行,而有罪就必有罚,这是上帝公正审判的必然结果。这些信念构成传统西方文学的重要内容。但丁

《神曲》九层地狱中被上帝咒诅受残酷刑罚忍受无限痛苦的罪人,莎士比亚剧中伊阿古、麦克白等,他们深陷于罪中不能自拔,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最后都受到上帝的惩罚走到毁灭的下场。

神性救赎:失落和原罪引导出《圣经》反复阐释的另一个主题“救赎”。《圣经》非常强调两种生命、两种灵魂、两个世界。失落要寻求救赎,罪人要获得新生。人类应通过自我的罪感和忏悔,通过吁求上帝的救恩,进而良心发现,人性复苏,重返家园。表达个人残缺、渺小、褊狭、昏愚的罪感心理,描述良心痛苦、愧疚、忏悔、获救的心路历程是西方文学的恒长主题。雨果的冉阿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他们为自己犯下的罪孽感到深深的痛苦并历经自我放逐的种种磨难最终在《圣经》找到心灵的皈依。托尔斯泰的《复活》可说是记载罪孽、良心、悔改、救赎、复活心灵史的现代《圣经》。

神圣之爱《圣经》立下爱的法规:第一“尽心尽力爱上帝”,第二“爱人如爱己”(《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38节)。这要求人首先爱上帝,并通过这种神圣之爱把限于血缘、自然、伦理、社会的世俗之爱提升到更高尚完善的状态,使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坚持爱的信念和意向。这样,爱就不仅朝向自我、我的血亲同胞、我的社会同志,而且朝向与我“无关”的人甚至罪人和恶人。<sup>[8]</sup>《圣经》强调圣爱博爱的感化力量对西方文学家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作品中有两类分别代表两种爱的人物形象:一类是为了世俗情爱赴汤蹈火的人物,另一类则是由于神圣之爱而无条件地把温柔、慈情、良善给予世界的人物。在他们的对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不可能,然而应该是”“最高理想法则”“爱是可以赎回一切、拯救一切的。……爱是无价之宝,可以赎回全世界的一切”。爱上帝、爱人如己、爱一切人的神圣之爱在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表达得更加引人瞩目。

灵魂永生:在《圣经》里,人是上帝按自己形象造出,上帝还向人吹入灵气使其获得生命,人因此具有灵魂、精神质素。人既不是自然的动植物的人,也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人;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超越自然、社会法则的精神意向,有寻求最高的真善美、渴望永恒的终极关怀。西方诸多文学作品都表现了对最高的真善美、永恒的寻求,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毛姆的《刀锋》,卡夫卡的写作,艾略特的《荒原》,普鲁斯特的《逝水年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它们所探

讨的不止是政治、经济、社会、时代的问题,而是更集中在生命与永恒、灵魂与不朽、最终的自由和出路的问题,专注于一种超越意义的人生追求,具有渴望永恒的精神维度。

道德完善《圣经》强调人应以至高至全的上帝为生存中心,以至善至美的耶稣为生活榜样,追求精神、心灵、道德、情感的价值和意义。耶稣一再申明“就算你们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灵魂,那有什么益处呢”(《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第25节)。这是说,实现个人幸福、社会解放的关键,不在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在于内在的精神道德灵魂方面。从这一原则出发,托尔斯泰文学创作探讨和表述了他最关注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他的全部作品可说是俄罗斯民族在对与生俱来的罪孽作深深的忏悔中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

基督式慈善《圣经》倡导慈善、怜悯、同情等道德品质,尤为重要是《圣经》强调这些品质必须通过纯然圣爱来显发实施。“即使我散尽钱财,救济穷人,或者舍己捐躯,任人焚烧,但如果没有爱,仍是毫无价值。”(《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章)这些美丽字句不仅流芳万世,而且形成了西人特有的慈善、怜悯、同情的心理内涵。像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作家,他们首先用耶稣基督式的慈善、怜悯、同情来注目人世,在作品中突出反映了这些神圣道德品质的奇迹般的感人力量。他们书中仁慈善良的正面人物自不待言,就连那些心灵麻木、堕落、冷酷的罪孽之辈,也会因为慈善、怜悯、同情的点化而良知萌发、人性复苏,像冉阿让一些人甚至变成神圣道德的殉难者。

担当苦难《圣经》用耶稣基督于尘世受难的一生表达了怀着深挚爱心在不幸的世界中担当苦难的信念。心灵的愚蛮、生活的破碎,人生的有限是人类现世的本质,我们所不得不栖身的地方充满不幸和苦难,但邪恶、不幸、恐怖、劫难虽然是人类的现世状态,却绝不是永远的必然状态。因此这个悲惨世界最需要爱,怀着爱心跟无辜者一起分担苦痛正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神圣的东西。<sup>[8]</sup>这个思想突出地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特别是《白痴》中的梅思金、《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一类人物形象。

生而平等《圣经》强调人是上帝之创造物,人人应当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卢梭基于《圣经》传统提出对后世西方整个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简爱追求独立人格尊严的苦难历程也响彻了《圣经》的足音:“你以为,只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站在上帝脚前,是平等的

——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

对大自然的感恩 按照《圣经》,大自然不是自生自在的,它来自上帝的创造并受到上帝的祝福。大自然承蒙神恩的观念明显地体现在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以重返中世纪、回到自然、复归基督教信仰为宗旨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夏多布里昂等视大自然为上帝恩赐,是永不受污染的心灵伊甸园,他们以虔诚静穆的态度领悟大自然中隐含的神意,对上帝的造物充满虔诚和仰慕。他们的诗中浸润着敬畏、恭顺、感激、祈祷、祝福等神圣情感的意向。

上面的《圣经》观念仅仅是为了叙述的简要而提取出来的,实际上,跟西方文学发生关系的《圣经》观念远不止于此。一些更为庞大的观念既复杂抽象又微妙具体渗透在西方文学中。比如《圣经》的“上帝”,它直接关系到西方文学整部历史的流程和变迁。搞懂这个上帝观念,才能理解中世纪的教会文学、骑士文学,文艺复兴以来种种以人为本的文学,以至现代派处处是局外人、空心人、变虫人、物化人、野兽人的荒诞文学。

确实,《圣经》基督教不仅是一段宗教历史现象,它更是一种思维、情感方式,它的观念和精神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人对历史社会、人类命运、个体生命等问题的看法,使罪与罚、罪与恕、道德与上帝、生命与永恒、博爱、仁慈、自由、平等、良心、希望等等成为西方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思想内容。

从各方面说,对《圣经》的无知,是解读西方文学的大障碍。《圣经》跟我们隔着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

的重重障碍,了解它也许是一件难事,但是我们要想准确理解西方文学,就必须注意《圣经》这一源头,搞懂《圣经》,从而用《圣经》提供的宏观透视力去考察西方文学。

### [参 考 文 献]

- [1] 诺思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 Michael Sugrue, Andrew Ford, Robert Hollander. The Bible and Western Culture[M]. Superstar Company, 1996; Lecture # 14, Lecture # 15.
- [3] 朱维之. 基督教文化[M]. 上海书店, 1992.
- [4] 郭海博, 李山. 圣经语典与妙用[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5] Robert Ackerman. 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A]. 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赏析系列丛书(英汉对照)[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 [6] 叶舒宪. 神话——原型批评[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7] 艾略特. 基督教与文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 [8]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第三章) 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苦难的世界[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收稿日期 2001-08-2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蒙本曼]

[作者简介] 金丽(1957-),女,满族,河北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广西南宁,邮编 530006。

### 陈益源《民间文化图像》出版

中国台湾学者陈益源博士的《民间文化图像——台湾民间文学论集》一书已于2001年12月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陈益源博士现任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在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域外汉文学研究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民间文学图像》一书是作者最新结集的一部专门研究台湾民间文学的专著,收有《明清时期的台湾民间文学》、《中国大陆整理出版的台湾民间文学》等10篇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在近年新作。该书作为由徐杰舜、周大鸣主编的《人类学文库》之一种,为读者了解台湾民间文化及其研究现状打开了一个通明的窗口。

(黄 钟)